

跨文化视野中的性别协商

——中国现代文人与伍尔夫女性主义

俞晓霞

摘要 国人对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品评与接受始于 20 世纪上半叶，由几位与伍尔夫有过交往或接触的中国文人率先开启。徐志摩最初对伍尔夫抱有“背女性”的偏见，几年后却成为伍尔夫女性观忠实的拥戴者与传播者；对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认同强化了林徽因的写作焦虑，并由此形成了林徽因女性书写的个人特质；受伍尔夫通信的鼓励及其著作的影响，凌叔华隐忍而模糊的女性写作意识开始趋于鲜明而坚定；40 年代萧乾对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评析则带有了更多客观与理性的色彩。这些中国文人对伍尔夫女性主义观点的悦纳、认同、借鉴与述评，共同彰显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敏锐、开阔的跨文化视野，以及在中西文化对话语境中渐趋审慎和理性的接受轨迹。

关键词 弗吉尼亚·伍尔夫 女性主义 性别协商 中国影响

作者俞晓霞，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杭州 311121）。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4)05-0179-9

除了在意识流小说理论与创作方面做出了许多创见性的贡献，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是世界女性主义诗学发展史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女作家。站在从传统迈向现代社会的门槛上，伍尔夫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审视历来文学史中女性遭受男性排挤与歧视的生存状态，发出了建构独立自主的“女性自我”、寻求男女双性和谐发展的呼声。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她带着对现代社会中女性角色的审视与反思，发表了许多有关女性主义与女性写作问题的论文和演说词。在《一间自己的屋子》《妇女与小说》中，伍尔夫提出了女人要拥有“自己的一间屋子”的著名观点，认为独立的经济地位是女人获得创作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基础；在《女人的职业》中，伍尔夫则要求女性们能够“杀死房中的天使”，女性不能再做温柔、顺从的男性附属品；《三个旧金币》则更猛烈地抨击了父权思想带来的社会弊端，指出正是男性对权势、财富的贪婪，最终把人类导向了战争与毁灭，而女性则无须为战争负责。从女权理论到文学创作实践，她的小说《远航》《夜与日》《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等，也显示着伍尔夫对女性心灵与命运的极大关注。在后期创作的小说《奥兰多》中，她的女性主义观点则由最初男女性别对立的激进和决绝，渐渐转向对双性和谐共存的期待。相对于她意识流小说的广受称颂，后人对伍尔夫女权观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呈现出不同时代发展状貌中思想碰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20 世纪初的中国，传统的动摇与裂变，同样孕育了渴望现代主义思想洗涤的社会潜流。这一时期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是和“放开缠足”“婚恋自由”“男女同校”等呼声联结在一起的。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胡适、鲁迅、陈独秀、田汉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女权启蒙的作品。在这些男性文人笔下，无论是对“娜拉式出走”的鼓励与反思，还是对女子“自主”意识的强调和呼吁，都把妇女解放问题和民族复兴运动联结在一起。女性追求平等的政治文化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文化革新的主题和目标之一。带着渴望

与西方现代性发展同步、重塑“中国文明”的焦虑，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被大量翻译和引进，如陈独秀翻译了法国人 Max O'rell 的《妇人观》，孟明翻译了日本小酒井光次的《女性与科学》，震瀛翻译了美国高曼女士的《结婚与恋爱》等。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也伴随其意识流小说的翻译，开始传播到中国，并陆续见诸国内报章杂志。

1933 年，伍尔夫的传记小说《弗拉西》在英国出版，而彭生荃女士的《书评·〈弗勒虚〉》随即于 1934 年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上刊载。文前的“编者按”说道：“华尔甫夫人文笔极细腻温柔，作风又极怡然自适，其所著 *A Room of One's Own* 叙述女子著作薄弱之物质上经济上原因。如怨如诉，连骂带谑，使须眉读了愧死。其文体似议论而非议论，似演讲而非演讲，总在讲理中夹入追忆，议论中加入幻想，是现代小品文体之最成功者。”^① 编者在介绍伍尔夫新出的小说时，也顺带介绍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的特征与影响。从现今已发掘的史料来看，除了 1929 年徐志摩发表于《新月》的演讲稿《关于女子》外，这段“编者按”也算是中国较早介绍伍尔夫女性主义观点的文字。

进入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除了小说，伍尔夫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开始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传播。1947 年 6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王还翻译的伍尔夫女性主义代表作《一间自己的屋子》。1948 年 7 月 10 日，《人间世》刊登了九叶派女诗人陈敬容署名“默弓”的评论文章，对伍尔夫著、王还译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进行了述评。文章不仅介绍了该书的主要章节，并且指出此书不像以往说教式论文那样枯燥乏味和生硬难懂，而是能在“温煦愉快的气氛中”做到“娓娓动听”。文章还联系了中国妇女的地位与现状，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予以了历史性的肯定：“历史是不会开倒车的。新世纪为妇女打开了门户，‘这一性’已经担负起种种光荣伟绩的缔造，又岂仅小说而已。”在文章结尾，作者呼吁读者能够“亲自一读”这本书，去了解其中的“真知卓见”，去领略那“风趣”和“精湛微妙的文笔”^②。

总体来看，20 世纪上半叶国内报章杂志对伍尔夫的关注，主要还是聚焦于其意识流小说创作的评介，对其女性主义思想的介绍与述评相对鲜见。真正推动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是几位与伍尔夫有过直接或间接交往接触的中国现代文人。他们通过公开演讲、著文评论、借鉴效仿等诸多方式，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带到了现代中国。

一、伍尔夫与徐志摩女性观的转变

早年留学英伦、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集团^③有交游往来的徐志摩，是较早关注到伍尔夫女性主义观点的中国文人。徐志摩最初与布派成员的交往，多集中在以剑桥校园为活动范围的罗杰·弗莱、阿瑟·韦利等人那里，并没有机会见到该集团的核心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姐姐瓦奈萨·贝尔。当时徐志摩对身为作家和画家的斯蒂芬家两姐妹的印象，更多源于一些道听途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揣测。1923 年，他在回忆自己与另一位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的短暂会面时，是把伍尔夫当做艺术界不伦不类的“背女性”来作对比的：“我到那时为止对于曼殊斐尔只是对于一个有名的年轻女作家的景仰与期望；至于她的‘仙姿灵态’我那时绝对没有想到。我以为她只是与 Rose Macaulay, Virginia Woolf, Roma Wilon, Mrs. Lucas, Venessa Bell 几位女文学家的同流人物。”^④ 在徐志摩这位中国男性文人的观念里，温婉可人应是女子该有的美质，而一旦女子太过有才，就往往会失却了女人本该有的气质和魅力，养成怪僻的、不修边幅的邈邈习性。所以当徐志摩惊讶于曼斯菲尔德的钟灵毓秀之时，他在脑海中浮现的，却还总是“女子有才便怪异”的男性主义思维：

平常男子文学家与美术家，已经足够怪僻，近代女子文学家更似乎故意养成怪僻的习惯。最显著的一个通习是装饰之务淡朴，务不入时，“背女性”；头发是剪了的，又不好好的收拾，一团和糟的散在肩上；袜子永远是粗纱的；鞋上不是有泥就是有灰，并且大都是最难看的样式；裙子不是异样的短就是过分的长，眉目间也许有一两圈“天才的黄晕”，或是带着最可厌的美国式龟壳大眼镜，但他们的脸上却从不见脂粉的痕迹，手上装

① 彭生荃：《书评·〈弗勒虚〉》，《人间世》1934 年第 2 期。

② 默弓：《“一间自己屋子”》，《人间世》1948 年第 2 卷第 5、6 期合刊。

③ 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是 20 世纪初期英国最负盛名的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团体，由弗吉尼亚·伍尔夫、罗素、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E. M. 福斯特、利顿·斯特雷奇、凯恩斯等众多文化圈名流组成。

④ 徐志摩：《曼殊斐尔》，《小说月报》1923 年第 14 卷第 5 号。

饰亦是永远没有的，至多无非是多烧了香烟的焦痕，哗笑的声音，十次里有九次半盖过同座的男子；走起路来也是挺胸凸肚的，再也辨不出是夏娃的后身；开起口来大半是男子不敢出口的话。^①

显然，在徐志摩最初的想象中，伍尔夫这类“唯智的”女作家往往是“矫揉造作”、不免引起“一种性的憎忌”的“背女性”。一直接受着西方文明洗礼的徐志摩，虽然早在其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中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随后也在《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白朗宁夫人的情诗》等文中论及女性地位和权利，而作为一名在传统男权意识浸润中成长起来的男性知识分子，徐志摩一开始的女性观显然有着偏狭的意味，他对女性作家的成见甚至还带有男性沙文主义的傲慢。和曼斯菲尔德的会面改变了他的看法，在阅读了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之后，伍尔夫更不再是他早年印象中“她们的全人格只是妇女解放的一幅讽刺画”^②的女性作家了。徐志摩在1928年写给罗杰·弗莱的信中，就恳求对方能提供机会，让他得以拜见这位令自己仰慕不已的女作家：“请你看看是否可以带我见见这位美艳明敏的女作家，找机会在她宝座前焚香顶礼。我很盼望在离开英国时能带着点点滴滴难忘的怀念。”^③只可惜徐志摩的第三次英伦之行来去匆匆，他最终也没能有机会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促膝交谈。然而这并不妨碍徐志摩对伍尔夫文学思想的吸收与借鉴，除了在《轮盘》等小说中有意模仿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手法，徐志摩还拜读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等伍尔夫的代表作，并把其中的女性主义思想带到了中国。

1929年，在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印行的同年，徐志摩发表了他在苏州女子中学《关于女子》的演讲词。在陈述中徐志摩有一段谦辞：“我不懂得科学，没有方法来解剖‘女子’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也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搬弄着一套现成的名词来清理恋爱，改良婚姻或家庭。……就好比是隔着雨雾望远山的景物，你只能辨认一个大概。也不知是那里来的光照亮了我意识的一角，给我一个辨认的机会。”^④那个照亮他“意识的一角”的“光亮”，应该就是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因为他接着马上提到：“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国一位名小说家做的，她说妇女们想从事著述至少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间屋子，这她随时有关上或锁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华银有六千元）的进益。她说的是外国情形，当然，和我们的相差得远，但原则还不一样是相通的？”^⑤这段引述自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的观点，既是徐志摩此番演讲的立论依据，也成为其后整篇演讲词的思路与灵魂统摄，而几近于同步的接受与宣讲，也显示了徐志摩对伍尔夫著述动态的及时关注与了解。

徐志摩从古今中外女性从事写作的艰难说起，探讨了文化史上女子的艺术成就不如男性的社会原因。他认为，除了各种有形的压制以外，女性自身的生理特性，以及传统文化、习惯、环境等因素，都对女性的独立发展形成了无形的束缚。这与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的相关思想如出一辙。伍尔夫在该著中就假设了一个有创作天赋却被生活无情扼杀的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丝，以这一女性形象艺术生命的被吞噬，来说明婚姻家庭、社会习俗、道德舆论等对女性艺术才能的禁锢与摧毁。在分析了当时女性生存状况的不易后，徐志摩在演讲中也展望了女性未来的生存图景。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已使得男性们再也不能在女性面前表现出性别的傲慢，他鼓励现在的新女子要转变以往女性那种传统的生活态度与人生目标，要对未来做大事以及男女平等的前景满怀信心：“新女子……我们却同时期望她虽则身体与心肠的温柔都给了她的郎，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却得贡献给社会与人类。”^⑥演讲过程中，徐志摩甚至还调用了伍尔夫的原话来阐明观点，比如在讲到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写作的艰辛时，徐志摩说：“‘女人从没有半个钟头，’Florence Nightingale说，‘女人从没有半个钟头可以说是她们自己的。’”^⑦这话差不多就是对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相关语句的翻版——“像南丁格尔小姐那样热烈地抱怨过——‘女人从来没有过半点钟……可以算作她自己的’——总有人来搅扰她，在那里写散文野史总比写诗写剧本要容易多了。因为不需要那么专心。简·奥斯汀一辈子都是那样写作的。”^⑧

徐志摩生活在新旧文化交替、传统与现代裂变的时代，他一开始带有偏见的女性“才德”观可以说代表

①② 徐志摩：《曼殊斐尔》，《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5号。

③ 徐志摩：《致罗杰·弗莱》，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6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3页。

④⑤⑥⑦ 徐志摩：《关于女子》，《新月》1929年第2卷第8号。

⑧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了当时中国社会大部分男人的传统意识。“所谓的才女，只是粗通文理，但她们沉溺于吟风弄月……为自己的造诣沾沾自喜，不知羞耻。这便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的源头”，“1907年吴涛在教科书《女子师范修身学》中对才女的批判反映了早期性别化的德才二分和对自由展示女性才能的强烈偏见”。^① 女子一旦有才，德能否配位姑且不说，异于传统女性的“怪”肯定是逃不掉的。正是这种偏见使得徐志摩对伍尔夫的印象经历了从鄙视到服膺的曲折历程。一生追求爱与美、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徐志摩，被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才气所折服，又通过其圈中好友罗杰·弗莱、阿瑟·韦利等的推介，在接触到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后，找到了能与自己灵魂与认知相契合的现代性思想资源。他对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赏识与运用，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女性观的成熟与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中西文化交流诉求，即希望通过对西方现代思想资源的悦纳、挪用和传播，让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也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

二、“一间自己的屋子”与林徽因的女性写作焦虑

作为西方女性主义的先驱，伍尔夫在其经典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的开篇，就提出了女作家必须“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的观点：“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② 这里的“一间屋子”，就是一个可以隔断喧哗的男性世界的创作空间。女性只有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我空间，才能凝神静息地审视一直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大千世界，寻找女性自己的视角，发出女性特有的声音。一旦妇女获得了许久以来一直被剥夺了的东西——“闲暇、金钱以及一间她自己的房间”，那么她们“自然就会比以往更多地从事于文学创作。她们将更充分地、更精巧地运用那种写作工具。她们的技巧将更为大胆和丰富”^③。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姐姐瓦奈萨·贝尔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中为数不多的女性成员，她们以自己独特的女性魅力和不输于男性的智慧与勇气，成为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每周四集会聚谈的核心。这两位女性的存在，“就好像横亘在男性自由论谈水流中的大坝，使得他们聊天的话题趋向于抽象与哲学”^④。一方面，伍尔夫对于文学的爱好与天赋，对于女性主义思想的独特创见，在布鲁姆斯伯里那些男性知己的鼓励与支持下逐渐明晰并显露出来；另一方面，传统男权意识浸润下剑桥男人们无意间流露出来的性别优越感，也使得伍尔夫感受到生活在这些出类拔萃的知识男性中所承受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伍尔夫女性主义观点的相对坚定与激进。

20世纪30年代的林徽因，也有着和伍尔夫相类似的文化身份诉求。林徽因的美国挚友费慰梅曾说：“听她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其他。”^⑤ 林徽因早年跟随时任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父亲林长民游学英伦，“在英伦期间，林长民携徽因进入一个包括H. G. 威尔斯，E. M. 福斯特、A. 韦利、T. 哈代、B. 罗西尔、K. 曼斯菲尔德的社交圈子，并在这里结识了徐志摩。”^⑥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林徽因曾经进入伍尔夫家的布鲁姆斯伯里聚谈，但她和徐志摩熟识，自己又精通英文，自然不会错过阅读伍尔夫的相关小说与论著。除了对其意识流小说进行有意模仿，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点也深得林徽因的认同。林徽因和梁思成婚后的家——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是当时一批精英知识分子聚会的场所，在这一类似于布鲁姆斯伯里的公共空间里，林徽因与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张奚若等诸多男性作家或学者一起探讨文艺、学术、社会等话题。或许是受伍尔夫的大胆与勇气的感染，林徽因同样“不让须眉”地展示了自己的学识与智慧，赢得了男性知识精英们普遍的尊重，成为“太太的客厅”里当仁不让的主角。费慰梅对此曾有追述：“其他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地长于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

① 季家珍：《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杨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

②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第2页。

③ 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瞿世镜编选：《伍尔夫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92—593页。

④ Leon Edel, *Bloomsbury: A House of Lions*,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79, p. 125.

⑤ 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⑥ 陈钟英、陈宇：《林徽因年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注：这里的E. M. 福斯特、韦利等人，都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或圈中好友。

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① 尽管“太太的客厅”也曾招致非议^②，但林徽因丝毫不惧流言，依旧做着她的沙龙女主人。林徽因曾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画了一幅北总布胡同梁宅的平面图，名曰《床铺图》，除了用调侃的语调论及家里亲戚仆佣杂多，另有注：“自用；浴室；厕所和更衣室；书房；办公室；起居室（非常高兴我总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③。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起居室，正是林徽因对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的回应。

虽然在精英男性空间里获得了女性言说的权利，但林徽因依然能感觉到身处男权社会中女性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渴望拥有伍尔夫所说的“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以便取得能和男性进一步平等对话的权利。“五四”落潮以后的中国社会，旧思想与新道德交织并存。在当时的社会认知中，女性接受现代教育已被广泛认同，具有独立意识的职业女性受到尊重，但“相夫教子”“贤妻良母”这些对传统女性的要求也并未远离社会舆论场域。热爱文学创作，又精于建筑专业的林徽因，一方面深深认同西方传来的女性主体性观念，另一方面又无法割舍做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试图在这种双重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中获得两全的平衡。1931年农历正月初一在给胡适的信中，林徽因写道：“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子地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④ 她不愿意做相夫教子的“平庸女子”，而家务琐事对交流和写作时间的侵占，又让她深感悲哀、烦躁与焦虑：“当我在做那些家务琐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悲哀，因为我冷落了某个地方某些我虽不认识，对于我却更有意义和重要的人们。这样我总是匆匆干完手头的活，以便回去同别人‘谈话’，并常常因为手头的活老干不完，或老是不断增加而变得很不耐烦。”^⑤ 不满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判，使得林徽因有着与伍尔夫一样颠覆女性传统角色定位的自觉和贯穿一生的主体身份焦虑。她渴望能自由自在地写小说，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写作工作，“只有当那是‘Joie de vivre（法语，生活的快乐）的纯粹产物’时，我的成绩也最好”^⑥。林徽因深信，女性唯有同时拥有足够的金钱和闲暇，从传统女性角色定位以及繁重的家务琐事中挣脱出来，才有可能更全面地去观察世界，充分施展自己的文学才能。

林徽因和伍尔夫一样，怀揣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除了在客厅里和精英男性们“高谈阔论”或“唇枪舌战”，也把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基本权利的诉求融入到了小说创作之中。这一时期林徽因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女性悲剧命运的小说。如《文珍》中的丫环文珍出身卑微，命若浮萍，而另一丫环文环则被富家少爷始乱终弃，最终被迫跳井致死；《绣绣》中的绣绣母亲被另结新欢的丈夫遗弃，绣绣则因承受父母失和的重负最终郁郁而死；《九十九度中》里的少女阿淑虽心有所属，但最终迫于无奈嫁与他人。面对这些处于传统男权社会中弱势女子的悲惨命运，林徽因在看似平静与理智的叙述中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⑦的林徽因，并没有像中国传统女性写作那样，借助女性凄惨命运的演绎，来传递极致的绝望与悲观情绪。也许是受到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鼓励，林徽因的这些小说更多流淌着一种对女性如何争取自身生存权和幸福权的憧憬和渴望。比如《文珍》中的丫环文珍，尽管是那个等级森严的男权社会里如尘埃般微贱的存在，但她却一贯乐观开朗，而且还有着一一种看穿世事的清醒与独立。她最终不愿屈服于被安排嫁给管账先生的平庸命运，而是选择了逃离，甚至还有可能是跟着隔壁的革命党私奔了。在文珍的命运转折里，折射出林徽因对女性追求自身幸福的无限期待。

和伍尔夫的《远航》《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等小说相似，林徽因的这些小说以女性为观察视角和言说主体，立足于对女性命运和心灵世界的书写，伸张女性作为一种平等的性别存在，以“细密而蕴藉”^⑧的情感来表达对女性基本权利的诉求。伍尔夫想让天下女性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思想，不但使林徽因产生了同为女性作家的性别焦虑认同，也渗入了林徽因的小说写作，并铸成了其文本鲜明的女性生存意识以及对男权社会压制女性自由的批判锋芒。

① 费慰梅：《回忆林徽因》，蔡元培、林语堂、胡适等：《品·味：为了忘却的永恒》，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② “太太的客厅”源自冰心带有讽刺性和暗指性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平津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关注，林徽因后来托人捎了一坛山西陈醋给冰心以示反击。

③⑤⑥ 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六）》，《林徽因诗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06、207、207页。

④ 林徽因：《致胡适（四）》，《林徽因诗文集》，第183页。

⑦ 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五）》，《林徽因诗文集》，第205页。

⑧ 李健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88年，第63页。

三、伍尔夫对凌叔华女性写作的鼓励与推动

凌叔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即因出色的绘画与文学才能，被徐志摩称为“中国的曼殊菲尔”。1922 年，身为直隶布政使之女的凌叔华入读燕京大学外文系，就此以时代新女性的角色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923 年 8 月，凌叔华以“瑞唐女士”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了纯阳性的讨论的感想》一文，其女性主义思想开始崭露头角。她认为，《纯阳性的讨论》的作者萧度对女性写作的品评完全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这并不符合女性写作的实情，“藉此，或者能使男界读者，瞭然于我们并不是把有用的光阴消耗到‘擦雪花拍香粉上’，或是守‘内言不出’的老法，并‘甘心自暴自弃路上去’”。^①在文章的结尾，凌叔华提请男性作家要尊重女性的写作，希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能够正视女性写作的能力，“千万不要把女子看作‘无心前进的，可以作诗就算好的，或与文无缘的’一路人”^②。她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就表示，有感于“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自己要“立定主意作一个将来的女作家”^③。

作为一位出身高门巨族的大家闺秀，凌叔华从小生活优渥，不曾经历多少人间风雨，而且由于一直以来所受中式传统教育的浸染，也使得她的女性意识起初并无激越和决绝的成分。她早期发表的一系列小说，从《女儿身世太凄凉》到《绣枕》《有福气的人》《中秋晚》，在对灰暗深闺生活的描绘中，揭示了旧式女子寂寞无助的命运悲剧，隐含了对女性卑微存在的同情。对于那些遭受命运捉弄的旧式女子，凌叔华除了深深的喟叹与同情，还夹杂着些许男权话语中习见的讽刺与无奈。而在《酒后》《春天》《花之寺》等小说中出现的现代女性，接受着新思想的吹拂，偶有越轨的念头却最终还是止步于“贤妻良母”的框约。这些新女性往往以“太太”的身份出现，妻子和情人身份的二合一，温柔贤淑与才情浪漫的兼而有之，迎合的恰恰是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女人形象。“太太”这一社会角色一方面给予女性幸福，一方面也在剥夺她们像主体一样行动的可能性。^④毅真在《几位中国当代的女小说家》一文中，把凌叔华概括成“新闺秀派”作家，他认为凌叔华没有如冰心、绿漪写“闺秀派”小说那样受到礼教的牵制，但也没有丁玲、沅君写“自由恋爱”的“新女性”的勇气，“究竟有些顾忌而不敢过形浪漫”，就像其小说《花之寺》中的中年太太，“她的行为是一个新女性，但是精神上仍脱不掉闺秀小姐的习气”^⑤。正如鲁迅对凌叔华的评价那样：“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⑥

凌叔华有反抗男性霸权的意愿，但与此同时又自愿选择了信守父权制及其写作规则的契约，以使她的写作看上去不具威胁性，“现代但却有节制”^⑦使得凌叔华早期的女性主义表达隐忍而模糊，带有更多性别协商的意味。

1938 年，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的婚外恋情因后者的阵亡无果而终，凌叔华却因此开启了和朱利安远在英国的姨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通信。起因是伍尔夫按照朱利安生前的要求，给凌叔华寄去了自己的几本著作，其中就包括她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一间自己的屋子》。凌叔华在读了这本书后，产生了给伍尔夫写信的冲动：“有一天，我碰巧拜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己的一间屋》一书，她的书令我如此兴奋，我突然决定给她写信，看看如果她处在我这种境况会如何处理。”^⑧或许是出于对死去侄儿的怀念，或许是对同处战争与社会动荡之中女性悲惨命运的认同，伍尔夫很快给异国他乡的凌叔华回了信。信中伍尔夫鼓励凌叔华用写作来排遣痛苦和焦虑：“工作是此时一个人能活下去的惟一途径。”^⑨鉴于凌叔华有不错的英文功底，伍尔夫多次建议她创作一部英文文学作品，完成朱利安生前曾对凌叔华提过的用英文叙述中国故事的夙愿。诸

①② 凌叔华：《读了纯阳性的讨论的感想》，陈学勇编：《凌叔华文存》（下），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803、805 页。

③ 凌叔华：《致周作人》（一），陈学勇编撰：《中国儿女——凌叔华佚作·年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年，第 182 页。

④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88 页。

⑤ 毅真：《几位中国当代女小说家》，《妇女杂志》1930 年第 16 卷第 7 期。

⑥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林非主编：《鲁迅著作全编》第 2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927 页。

⑦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51 页。

⑧ 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万江波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年，第 385 页。

⑨ 杨静远：《弗·伍尔夫致凌叔华的六封信》，《外国文学研究》1989 年第 3 期。

如“朱利安常说，你的生活极为有趣；你还说过，他请求你把它写下来——简简单单，一五一十写下来，完全不必推敲语法”；“确实，我们曾经讨论过（通过书信），你是否有可能用英文写下你的生活实录。这正是我现在要向你提出的劝告”^①。

凌叔华与伍尔夫之间的通信历时两年多，在伍尔夫的鼓励下，凌叔华开始了自传的写作。伍尔夫不断向她推荐和邮寄书籍，指导凌叔华通过速读多掌握英文词汇，“自由”地“写下所能记得的任何一件事”，而她则会“欣然拜读”并“作必要的修改”。伍尔夫给凌叔华寄去《夏洛蒂·勃朗特传》，旨在让凌叔华领略“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的生活——她们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她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她劝凌叔华写作时“尽可能接近于中国情调”，尽可能“保存它的中国风味”^②，以异质性的民族特色来激起英国读者的兴趣。从1938起开始动笔，于1952年最终完稿出版，凌叔华的英文自传《古韵》（*Ancient Melodies*）以一个女童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展现了20世纪初一个中国传统大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依附其中各色人物的喜怒哀乐。^③可以说，这篇自传从创作伊始，一直是在伍尔夫女性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双重期待和注视下完成的。

相较于凌叔华早年创作的小说，《古韵》中的女性主义立场变得鲜明而坚定。自传中提到，凌叔华是父亲凌福彭第四房姨太的庶出女，在家排行第十。身居父权制之下的中国传统大家庭，凌叔华从小就见惯了父亲的众多妻妾为争宠而互相谩骂甚至大打出手，而自己被父亲另眼相看也是因为偶有客人发现了她的涂鸦才能。从母亲到姨娘，从主母到丫鬟，包括凌叔华在内的这个家族中所有女性的悲喜，都和父权家族中男性长辈掌控一切的规则和意识息息相关。在这部自传中，凌叔华对中国传统家庭生活真相的揭示直接而犀利，处处显露着作为男性附属品存在的中国旧式女子的艰辛悲苦，更透露出“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愤愤不平。在《古韵》第十章，凌叔华写到了自己和叔祖独处的时光，从饱读诗书又相对开明的叔祖那里，幼年的凌叔华接受了诸多女性意识的启蒙。比如听到古代女子有女扮男装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扮成男人参加科举考试；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之所以招人抨击，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男人们嫉妒她的才华和能力。“这些鼠肚鸡肠的小人不愿看到一个女人治理整个国家”^④，这句爱憎分明、为武则天鸣不平的话虽出自叔祖之口，表达的却是凌叔华日益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

伍尔夫认为受控于男性文化霸权的女性写作，需要更为鲜明的女性立场和我行我素的抗争姿态，才能显示与男性写作的区别。有别于之前的“新闺秀派”小说，凌叔华在《古韵》中以女童的视角展开对成人世界规则的审视与批判，尝试用一种更加明确的女性主义立场与态度，来取得伍尔夫与西方读者的认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以性别的眼光来阅读《古韵》，我们会发现《古韵》的女性主义视角和凌叔华早年的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系。在早年的小说中，女性主义意识总是在与父权制和现代性协商的复杂系统中被表达出来。而在《古韵》中，作者的表达方式则是直率明白的。”^⑤在伍尔夫影响和鼓励下写作的凌叔华，逐渐从温婉感伤又带有自哀自怨色彩的传统女性写作中挣脱出来，以更具现代意识也愈加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呈现出她在具有了跨文化视野之后试图与西方现代思想接轨的尝试和努力。

四、萧乾对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述评

20世纪30年代，萧乾还在中国燕京大学读书时，就赞赏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1939年，萧乾受邀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他到达英国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见见那位他仰慕已久的女作家。不巧的是，当时的伍尔夫和丈夫伦纳德住在离海岸很近的苏塞克斯郡的“僧侣屋”，而萧乾却被无缘无故地当成“敌性外侨”，禁止涉足距海岸5英里以内的任何地区。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萧乾才在一夜之间成为“伟大盟邦”的一员。可惜这个解禁来得太迟，弗吉尼亚·伍尔夫已经在当年3月投河自尽。她逝世后，萧乾才到苏塞克斯去，和伦纳德·伍尔夫相识。据萧乾回忆：“对她一往情深的丈夫十分殷勤地接待

①② 杨静远：《弗·伍尔夫致凌叔华的六封信》，《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

③ 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41年3月投水自尽，凌叔华其后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的帮助下，于1952年完稿并在次年出版她的这本英文自传《古韵》：Ling Shuhua, *Ancient Melodie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3.

④ 凌叔华：《古韵》，傅光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6—77页。

⑤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第246页。

了我。我到他那里去度周末的时候，他领我去她投河自尽的所在，还允许我阅读并抄录她的一部分日记。不幸的是，我所有的笔记都毁于文革。”^①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 E. M. 福斯特之前向萧乾推荐过伦纳德·伍尔夫的文章，后来又在信里转述伦纳德对萧乾这次访问的感受，“说到萨·塞克郡，伦纳德·吴尔夫来信说，他对你的访问非常高兴”^②。知道萧乾有意研究英国现代派小说，福斯特还特意建议萧乾去听自己有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讲座。^③

尽管没能见到弗吉尼亚·伍尔夫，但萧乾随后在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期间，还是大量研读了她的作品，并写下了不少评论文章。除了《V. 吴尔夫与妇权主义》《吴尔夫夫人》等关于伍尔夫的专论文章，萧乾在《詹姆士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小说技巧小论——评〈关于叙述艺术的几点看法〉》^④等文章中，也屡屡提及伍尔夫及其小说创作。在这些文章中，1948年9月2日发表于《新路》周刊第1卷第20期的《V. 吴尔夫与妇权主义》，应该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全面评析伍尔夫女性主义观点的文章。文章开篇，萧乾以充满诗意的文笔描述了身为作家的伍尔夫及其女性主义思想：“一般人心目中和将来文学史上的吴尔夫，都是个象牙塔中的贵妇人，望着波浪，望着无垠的田野，冥想辽阔或悠古的事物。然而吴尔夫也自有她的烦恼，她的愤慨。她恨男人的专，她怨女人所遭的歧视与压迫。”^⑤他从伍尔夫1913年参加英国新堡的妇女合作大会开始说起，讲到她早年写作短篇《社交界》嘲骂天下男人，讲到她1938年出版更为激进的《三个吉尼》（《三个旧金币》），颇为全面地回顾和总结了伍尔夫的写作历程及其女性主义思想。

萧乾从几个方面评介了伍尔夫妇权主义思想的由来和构成。他指出，伍尔夫女权思想的生成，更多是源于对自私、倨傲、性灵泯灭的男性的鄙视，以及对一贯以来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激愤；伍尔夫带着报复的情绪狠狠讽刺男性，把妇权主义的诉求集中在女子教育和妇女参政上面，而“经济独立”才是她妇权观念中“顶不动意气而又是顶妥实的”的；伍尔夫“和所有的女权主义者一样”，认为“装饰和贞操是妇女变成男人玩偶的内外两个主因”^⑥。在萧乾看来，尽管伍尔夫积极倡导妇女运动，但在小说创作中却极力避开这一极具处理难度的话题。伍尔夫没有像夏洛蒂·勃朗特那样，把难以抑制的女性意识直观、大胆、义愤地表露在作品中，而是尽力平心静气地把这种情绪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航程》《夜与昼》《到灯塔去》《奥兰多》等小说中的妇权主义元素，主要来自伍尔夫有关女性“怨艾”角色的塑造，以及对男性自私、倨傲等阴暗面的批判。

与此同时，萧乾又不无敏锐地指出，伍尔夫在提出这些妇权观点时，自己是不乏矛盾与犹豫的。在小说中，她往往把妇权运动和恋爱交织起来，很多时候妇权最终却仅只沦为“恋爱的替代”和“情感的尾间”^⑦。她通过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或不甘躲在深闺或从事妇权工作的女性人物，借她们的口喊出了女性争取平等的声音，却没有用太多笔墨书写女性的自食其力和勇往直前。因为伍尔夫似乎也意识到，想让女性真正脱下取悦男人的衣装，挣脱宗教般束缚女性的贞操观，取得真正意义上不靠男人而活着的经济独立，又谈何容易。所以在伍尔夫的小说中，读者很难找到魄力十足的对抗传统贞操观的女性，而伍尔夫本人不劳而获的“独立”，也使得她的“怨艾”其实并非出自自身的遭际。因此对于下层妇女们而言，她的女性主义观点还是显得陌生和充满隔膜的。

和前面几位中国文人不同的是，萧乾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不再是感性意义上的认同与接受，而是有了更为理性和客观中肯的评析。如萧乾对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给予了肯定，说这篇演讲词“比较值得一看”，其主题是“想写作，先得争得经济独立”，用了“最馋人的笔”，能够“引古证今”地证明女子自古以来都是父亲或丈夫的笼中鸟，“多少才女因此抑郁而死，多少肥胖的男子坐在沙发上咆哮着侮女论”；但他同时指出，“这书顶可贵的其实是后半：指点女作家应走的方向。作为普遍女作家的路子，那当然显得偏狭”^⑧，因为伍尔夫多是从自己的妇权观念和文艺理想出发来提建议的，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女性写作者。他说伍尔夫专写妇权的《社交界》和《三个吉尼》等作品，“都是她最失败的作品，不值一看，也一点不像她写的”^⑨。《社交界》“用杂乱无章的荒唐情节，藉三个女孩子替吴夫人把天下文武男人痛痛嘲骂了一阵”^⑩；而

① 萧乾：《我在英国结交的文友》，《萧乾忆旧》，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6—257页。

② 福斯特致萧乾，1943年10月16日，李辉译：《爱·摩·福斯特致萧乾的信》，《世界文学》1988年第3期。

③ 福斯特致萧乾，1942年4月27日，李辉译：《爱·摩·福斯特致萧乾的信》，《世界文学》1988年第3期。

④ 这些文章大都写于1942—1944年，当时萧乾在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20世纪40年代末萧乾回国后得以发表。

⑤⑥⑦⑧⑨⑩ 萧乾：《V. 吴尔夫与妇权主义》，《新路》1948年第1卷第20期。

关于《三个吉尼》这部痛击社会轻视女性的作品，他则和 E. M. 福斯特观点一致，^① 认为那“简直是吵嘴骂街的书”^②。在萧乾看来，伍尔夫在著作中鲜明、激进地表达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这是“写得好，写得有力”的，但“却不适于她的教养与素质”。而伍尔夫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不是因为她激越的男权批判精神，而是她所作的“最严峻的自我批评者”的角色定位，以及由此获得的“自知之明”。萧乾认为这才使伍尔夫最终摆脱了专写妇权思想的试验，而开始致力于在文学具象的描绘中含蓄地渗入自己的愤慨，“这点自知之明，是她成败的一个大关键。否则二十年代英国妇权运动促进会也许添了一批宣传小册子，然而英国文学史上也将永远失掉了一枝充满了奇迹的笔”^③。

和福斯特私交甚好的萧乾，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和布鲁姆斯伯里男性成员们一样的男性优越感，在述评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时候，其内心深处的男性意识似乎还是掺杂其中。福斯特曾在剑桥大学作过一次有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讲座。在讲座中，身为好友、小说家和批评家的他高度评价了伍尔夫，赞扬她能同时用严肃的态度和娱乐的心情进行小说创作，却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她的恃才傲物和女权思想。福斯特甚至认为，在男女差异不断弱化的现时代，伍尔夫的女权观显然已经“老掉牙”和“极端”了，执着于喋喋不休的抱怨更是一种“不通情理”的表现。^④ 相对而言，萧乾对伍尔夫女性主义的述评则要公允温和得多，他肯定了伍尔夫女性观的进步之处，当然也中肯直率地指出了她女性主义思想中存在的过激言论、文体错位和矛盾混沌之处。相较于徐志摩和福斯特，萧乾的述评显然更带有一种学术探究意义上的理性与客观。

20 世纪上半叶，这些熟悉英美文化的中国文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早期接触者和传播者。他们或在与伍尔夫的直接交往中见识了她的气度与才华，或通过阅读其有关女性观的作品引发了情感与思想的共鸣，他们对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大力推介及创作上的积极借鉴，彰显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文艺界敏锐与开阔的跨文化视野，以及在反叛传统中构建现代文明的迫切愿望。从 20 年代徐志摩对伍尔夫女性观的悦纳，到 30 年代林徽因、凌叔华对伍尔夫女性写作焦虑的认同与主动借鉴，再到 40 年代萧乾对伍尔夫女性主义述评的渐趋审慎与理性，恰恰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国人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态度演变轨迹。

(责任编辑：张曦)

Gender Negotiation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 Woolf's Feminism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i

YU Xiaoxia

Abstract: The evaluation and acceptance of Woolf's feminism by Chinese people bega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itiated by several Chinese literati who had contacted with Woolf. Xu Zhimo initially harbored a prejudice against Woolf, but a few years later he became the faithful supporter and disseminator of Woolf's feminist views.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Woolf's *A Room of One's Own* strengthened Lin Huiyin's writing anxiety and thus formed her personal traits in female writing. Encouraged by Woolf's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d by his works, Ling Shuhua's restrained and vague female writing consciousness began to become clear and firm. In the 1940s, Xiao Qian's analysis of Woolf's feminist thought was more objective and rational. These acceptance, identification, reference, and commentary on Woolf's feminist views collectively demonstrated the sharp and broa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ly cautious and rational acceptance trajectory in the context of Sino Western cultural dialogue.

Key words: Virginia Woolf, feminism, gender negotiation, China influence

① 弗吉尼亚·伍尔夫着力批判男性特权、偏见与虚荣的女性主义檄文《三个吉尼》于 1938 年发表后，除了招致外界评论的猛烈抨击，就连布鲁姆斯伯里圈中的男人们也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凯恩斯感到“愤怒与鄙夷”，E. M. 福斯特认为这是她“写得最糟糕的一本书”。参见吴庆宏：《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妇权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2 页。

②③ 萧乾：《V. 吴尔芙与妇权主义》，《新路》1948 年第 1 卷第 20 期。

④ 摩根·福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罗森鲍姆编：《岁月与海浪》，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38 页。